

目 录

唐代吐蕃文化史研究二三则	林冠群 / 1
布达拉宫馆藏多巴·扎西杰布所绘唐卡初考	旦增央嘎 班旦次仁 / 19
甘肃永登感恩寺明代宗喀巴传记唐卡研究	赵媛 杨旦春 / 39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三十五年藏文泥金《甘珠尔》经造办、流传与存藏考述	李若愚 / 117
以母范而兼帝范——普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佛楼研究	王彦嘉 / 141
清代前期松潘河源道初探	张钦 / 162
从屯堡到番寨：明清青海同仁地区的聚落变迁与社会转型	许若冰 / 178
司徒班钦加德满都谷地之行与文化交往的考察	姚婧媛 / 192
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人事管理档案及人事管理制度研究（1794—1957 年）	道帙·才让加 / 210
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库伦返藏考论	刘维栋 / 250
《究竟瑜伽鬘》摘译——金刚萨埵曼荼罗、智慧空行母曼荼罗、喜金刚曼荼罗、 无我母曼荼罗	张雅静 / 266

跨文化背景下尼泊尔离车碑铭的历史价值：过去、现在与未来

..... 阿闍黎·启昼、明霓 著 罗鸿 译 / 293

摘 要 / 315

Table of Contents

A Study on Three Topics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ubo <i>Lin Kuanqun</i>	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 Thangka by Mdo pa Bkra shi rgyal po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otala Palace <i>Tenzin Yangkar Paldan Tsering</i>	19
A Study of a Ming Dynasty Thangka of Tsong kha pa's Biography Housed in the Gan'en Temple, Yongdeng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i>Zhao Yuan Yang Danchun</i>	39
Notes on the Cre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Golden Ink Kanjur Made in the Thirty-fif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Housed in the Palace Museum <i>Li Ruoyu</i>	117
Maternal Model and Emperor Normalization —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Building in the Long'en Hall at the Dingdong Mausoleum in Putuoyu <i>Wang Yanjia</i>	141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ongpan-Heyuan Route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Zhang Qin</i>	162
From Farming Forts to Tibetan Villages: Settlement Chang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b gong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Xu Ruobing</i>	178

An Investigation of Situ Pañchen's Visit to the Kathmandu Valle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Yao Jingyuan</i>	192
A Study of Officials Management Archives and Systems of the Dga' ldan Pho Brang Local Government in Tibet (1794-1957) <i>Dobis Tsering Gyal</i>	216
A Study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s Return to Tibet from Kulun <i>Liu Weidong</i>	250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the <i>Niṣpanṇayogāvalī</i> : The Vajrasattvamaṇḍala, Jñānaḍākinīmaṇḍala, Hevajramaṇḍala, and Nairātmyāmaṇḍala <i>Zhang Yajing</i>	266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icchavi Inscription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i>Diwakar Acharya and Nina Mirnig</i> <i>Chinese Translation by Luo Hong</i>	293
ABSTRACTS	315

从屯堡到番寨：明清青海同仁地区的 聚落变迁与社会转型^{*}

许若冰

内容摘要：明清中央政府的制度设定与政策调整深刻影响着青海同仁地区的聚落形态、民族格局与社会结构转型，当地的保安四屯便经历了从卫所屯堡到隆务番寨的转变，屯田军户亦演变为番寨土人。明前期，明廷设置必里卫并以土官管理藏族部落，又遣河州卫四屯军户驻扎同仁，扶持以隆务寺为代表的僧团力量，当地形成藏族部落、屯堡军户与寺院僧团并存的格局。面对明末清初藏边局势的演变，失去明朝庇护的四屯军户基于现实生活的考量策略性地化身为“土人”融入隆务十二部，既作为隆务寺属番民，亦是官府所辖屯民。明清以来这些屯军后裔在与藏族部落的日常交往中衍生出诸多汉藏交融的文化符号、信仰体系与社会习俗，反映出汉藏民族求同共享的文化整合逻辑与相处之道，也展现出明清汉藏居住交界地区“多元一体”民族社会的形成过程与演进机制。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研究专项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历代中央对藏族僧俗首领册封大型文献资料整理及治藏方略研究”（21VMZ007）阶段性成果。

地处汉藏等各民族交错居住地区的甘青川滇地带，既是中央政府经略藏地、控驭西北的核心区域，也是汉藏诸民族长期交往互动的中间地带，地域社会的历史遗迹与社会风俗因之呈现出诸多汉藏交融、层累而成的文化现象。自明清以来，位于青海东南部的同仁地区便保留了诸多卫所屯堡、寺院、碑刻文书等历史遗存，其中既有历时性的层累过程，又夹杂着跨民族的文化交融，折射出汉藏民族互动交融的社会实态与历史原貌。特别是明代迁居于此的卫所军户与周边藏族部落、寺院僧团世代聚居¹，区域社会的聚落组织、族群关系与文化风俗互为交织。综合考察明清卫所制度在汉藏交界地带的在地化过程及其对地域社会结构、聚落与人群关系的影响，既有助于探寻汉藏边区社会的演进过程与形成机制，亦可在区域社会脉络下深化对明清王朝制度的认知。

本文关注的同仁地区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域内山脉连绵，地势高峻，隆务河自南向北纵贯全境，兼有高山牧业及河谷农业，属于典型的农牧交错区与汉藏结合部。自永乐年间，面对当地藏族部落林立且难以控驭的局面，明廷既设土官，又分派卫所屯军驻守同仁，促使当地形成卫所移民军户与藏族部落互嵌并存的民族格局。进入清代，当地的聚落组织、文化风俗均呈现交融共生的发展趋势。乾隆年间，循化抚番同知龚景瀚在查访同仁地区原明朝屯兵后感慨：

屯兵之初，皆自内地拨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有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之番民矣。²

此处的“屯兵”即分列于隆务河中枢之地同仁地区的吴屯、季屯、李屯与脱屯的屯田军士，因其临近保安站，又合称“保安四屯”。入清以后，明代自“内地拨往”的军户已然“自认土人”，显然由明入清当地社会经历了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地方人群的族类身份、历史记忆与社会风俗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动。其中最典型的是从屯堡军户到番寨土人的转变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层累、交融的民俗事象。因其汉藏兼容的特殊文化风俗，保安屯民在民族识别中被认定为土族。当前围绕同仁四屯的研究涉及屯堡历

1 许若冰：《边疆治理视阈下明代隆务河流域民族互嵌格局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4）：122-130。

2 乾隆《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中国地方志集成·青海府县志辑》第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95。

史、民俗及文化认同等层面³，较少述及屯田军户的在地化及其与藏族部落的互动关系与文化整合等问题。故本文拟以明清同仁地区的卫所屯堡到寺院番寨的演变为主线，将卫所屯军与藏族部落、寺院僧团的互动关系置于区域社会的脉络下加以考察，分别探讨移民军户的迁入、演变及其与周边藏族部落、藏传佛教寺院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与文化整合现象，以期展现明清汉藏边区“多元一体”民族社会的演进机制与变迁轨迹。

一、明代保安四屯的设置与汉藏互嵌格局的形成

保安四屯位于今青海南部同仁地区的隆务河中游两岸，是明朝政府在黄河上游南部地区设置的重要军事据点。永乐九年（1411年），河州卫都指挥使刘昭奏请：“河州归德千户所去卫七百余里，东距川卜千户所，西距必里卫番族，南距朵土、川藏，北距黄河罕东卫界。旧于河州卫七所拨军二百守御，浮食寓居，不敷调遣。”⁴此处的“归德千户所”与“必里卫”均为早前设置于青海南部黄河上游地区的羁縻卫所。面对河州卫分派拨军“不敷调遣”的窘境，刘昭提议从河州卫分调千户所镇守归德、同仁一带，所谓“全调一所，选精锐二百守城，八百屯种及运入番买马茶。”⁵刘昭的建议获明廷首肯并很快得以实施。据《西宁府续志》记：“永乐九年，都指挥使刘昭请调中左千户一所驻贵德，拨河州四十八户，又拨十屯归贵德守御所管辖，而保安之吴屯、李屯、计屯、脱屯在其内。吴屯系江南民，季屯、李屯、脱屯系河州汉民，共九百九十户。”⁶新设置的归德千户所辖总计十屯，即今贵德县周、刘、王三屯，尖扎县康、杨、李三屯以及同仁县脱、吴、李、季四屯。其中的同仁保安四屯分列于隆务河中游两岸，便于修建屯堡、从事农业生产，各屯又互为犄角，相互应援，构成了明廷在黄河上游地区军事防御的一环。这些屯军大多征调自内地及沿边各地，史载“屯兵之初，皆自内地拨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有河州人。”⁷自永乐以后，由内地调拨的军

3 参见牟一之：《同仁土族考察报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历史》，《青海民族研究》1985（2）：147-196；宋挺生：《明王廷仪碑考释兼论青海同仁土族来源》，《青海民族研究》1985（2）：197-228；史丁：《保安四屯》，《青海民族研究》1993（2）：98；唐仲山：《青海同仁屯堡人端午节俗调查分析》，《民俗研究》2005（2）：61-73；祁进玉：《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294-299。

4 《明太宗实录》卷120，永乐九年十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1513。

5 《明太宗实录》卷120，永乐九年十月辛卯，1962：1513。

6 民国《西宁府续志》卷4《田赋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青海府县志辑》第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99。

7 乾隆《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2008：95。

丁携带余丁世代驻守隆务河畔，屯田耕作，繁衍生息并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屯田区。

为何永乐年间明廷要调遣千户所分驻黄河上游地区并在同仁设置百户所呢？这一问题需回到明朝初年黄河上游地区的整体局势与明廷的治边策略中加以讨论。早在洪武年间，明廷便在整合黄河上游地区番族部落的基础上设置了必里千户所与归德千户所。洪武初年，明军攻克河州、临洮等地后迅速进入黄河上游地区，当地蒙藏部落首领纷纷归附。为实现地方权力的平稳过渡，明廷大规模封赐地方番酋、头人以卫所世袭土官。洪武六年（1373年），明廷“以故元蒙古世袭万户阿卜束等十五人为必里千户所千百户，领其土人，镇御番溪界。”⁸ 此处的“阿卜束”即同仁阿哇日部落之首领，该部始祖尕日旦巴且东于十三世纪从西藏萨迦贡玛地方迁入同仁一带⁹。迟至元末，阿哇日部落首领阿卜束已成为必里万户府四大万户之一¹⁰。为嘉奖阿卜束归附之功，明太祖亲命其为武略将军、必里千户所副千户¹¹。仅两年后，明廷又置归德守御千户所，由端竹星吉等土酋担任千户¹²。永乐元年（1403年），初登皇位的朱棣为招抚番族、推行茶马交易，特升必里千户所为必里卫，“以故千户哈即尔加弟刺麻失加、千户阿卜束男结束为指挥僉事。”¹³ 新建立的必里卫属羁縻卫，设掌牌指挥二名、掌牌千百户十九名，分辖二十一名头目管理二十一族，每族领金牌一面¹⁴，作为差发马赋的凭证。阿卜束之子结束也顺利晋升必里卫指挥僉事，其主要职责便是组织番族开展茶马交易。永乐二年（1404年），阿卜束次子阿哈巴遣人进京请袭，明廷重申了对“汉人地面西边”各番族的管辖权并强调大明皇帝与阿卜束、结束形成的君臣关系，随后依例封赐阿哈巴为指挥僉事¹⁵。此时，世代承袭必里卫指挥僉事的阿卜束家族可谓盛极一时，而围绕必里卫也聚集了二十多个纳马番族部落。

自洪武至永乐年间，明廷基于茶马交易的考量将必里千户所升为必里卫，此举也引致地方土官番酋的势力日渐壮大。面对此种境况，明廷也适时地调整黄河上游地区的军事布防，由河州卫分兵驻扎于必里卫、归德千户所各辖区，以加强对当地的管控与治

8 《明太祖实录》卷 84，洪武六年八月戊寅，1962：1499。

9 参见王继光：《青海隆务河流域藏族来源的社会考察》，《西藏研究》1998（2）：66。

10 《元史》卷 87《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2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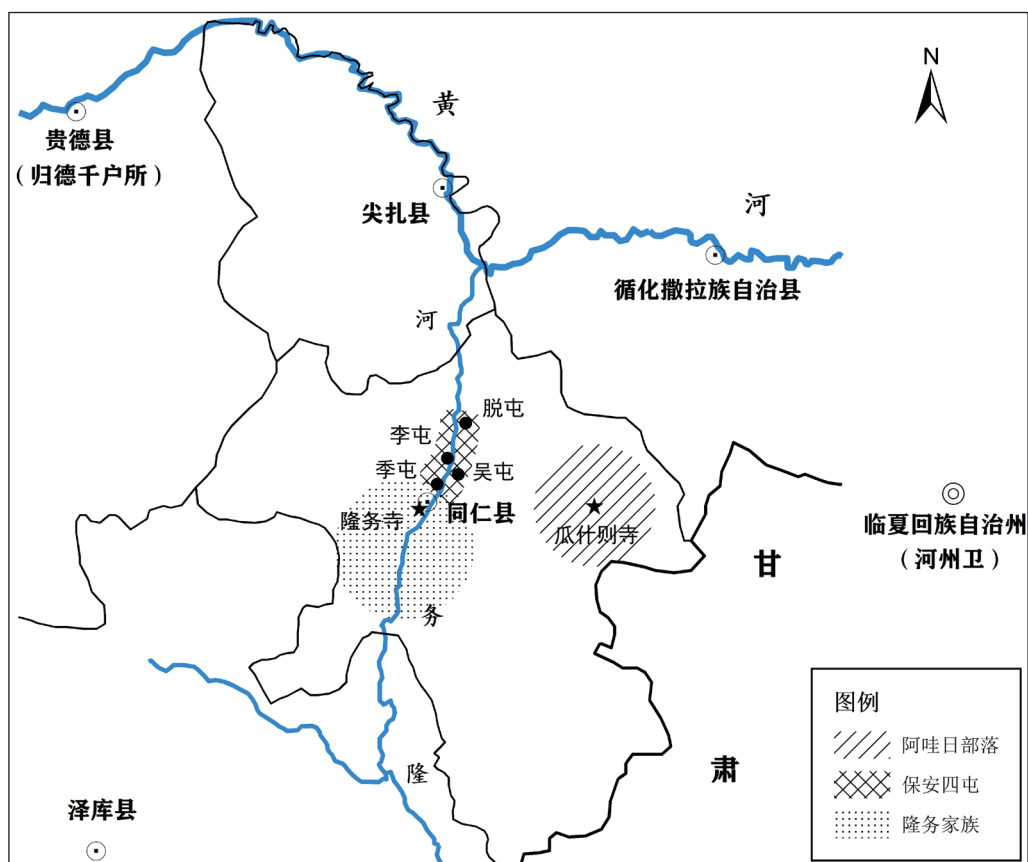
11 参见洪武六年明太祖赐阿卜束敕文，载青海省编辑组：《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5。

12 《明太祖实录》卷 96，洪武八年元月甲子，1962：1649-1650。。

13 《明太宗实录》卷 20，永乐元年五月辛巳，1962：356。

14 嘉靖《河州志》卷 1《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 40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4。

15 参见永乐二年明成祖赐阿哈巴敕文，青海省编辑组：《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1985：5。



图一 同仁县保安四屯、隆务寺、阿哇日部落示意图 [该图根据《青海省地图集·黄南藏族自治州》(星球地图出版社, 2017年)进行绘制]

理。此外,明廷还积极扶持当地的寺院僧团,明仁宗、宣宗两朝必里卫僧人纷纷进京朝贡并获封“国师”“禅师”等尊号¹⁶,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隆务寺(རོང་ཁོ་དགོན)及其附属僧团。隆务家族先祖拉吉直纳哇于13世纪由卫藏达木库隆务地方移居同仁地区,依靠医术吸引番众,传播佛法。至其子隆务桑丹仁庆时期正式创建隆务寺,据《安多政教史》载:“他与当地萨吉大百户结下了供施善缘,创建了大小寺院十八座,在贡库沟地方创建了隆务寺德庆曲科林。”¹⁷在隆务家族与萨吉百户的支持下,隆务寺聚集着大批番

16 参见《明仁宗实录》卷4,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乙未;《明仁宗实录》卷6,洪熙元年正月甲午;《明宣宗实录》卷97,宣德七年十二月丙申等,1962: 153, 223, 2188。

17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292。

众并逐步成长为必里卫土官、四屯军户之外的新兴力量。隆务寺在当地的发展也引来了明廷的关注，至洛哲桑格主理寺院时，因其学识渊博、通晓五明，而受到明宣宗的召请与册封¹⁸，隆务家族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宣德年间，明廷敕封洛哲桑格为“弘修妙悟国师”标志着隆务寺及其僧团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扶持，而隆务寺被敕封为“正宗寺”更加速了以隆务寺为核心的家族性政教合一势力的形成。隆务家族借助其“国师”身份，以隆务寺为中心聚合了相当数量的番族部落并成为必里卫与保安四屯之外颇具实力的地方力量。总之，由必里卫土官与隆务寺聚合的番族部落与明王朝分派的卫所军户共同汇聚于隆务河中游地区错落而居（见图一），番族部落从事牧业活动，卫所屯军则开展农业生产，互为补充，当地逐渐形成了农牧混合的经济格局与多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

万历年间，蒙古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会盟后大批蒙古部落移牧甘边、青海地区，严重冲击了明初以来当地形成的社会秩序，也对同仁地区的番族部落与卫所军户产生了深远影响。据《明史》记：“俺答迎佛，又建寺于青海，奏赐名仰华，留永邵卜别部把尔户及丙兔、火落赤守之，……真相进据莽刺川，火落赤据捏工川，益并吞番族。”¹⁹火落赤所据“捏工川”即今同仁县与夏河县之间的甘家滩，紧邻保安四屯。而火落赤是蒙古哆啰土蛮部领主，哆啰土蛮部是达延汗四子阿尔萨博罗特墨尔根鸿台吉（我折黄台吉）的部落，该部依附于俺答汗并成为土默特万户重要的鄂托克之一²⁰。火落赤跟随俺答汗参与仰华会盟活动后占据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捏工川并向外扩张。面对火落赤等部的袭扰，明廷在当地设置的长宁、银川、三岔、讨来、边多、清水、保安七站与番官以及吴、李、季、脱四屯军士显然难以应对。由此，明廷尝试重整军备，修建保安堡并设守备²¹。据万历二十八年《大明王廷仪碑》记：

夫保安者，为三秦之咽喉，狭九边之最冲。□□地东连边多、□□，西接讨来、归德，南临捏工、莽刺，北抵果木、黄河。然而番部邻□□处□□□□值□□桀恣无时□□，以故是地无官守防，无军所恃。如彼中廷仪，向为屯

18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1989：293；另见吉迈特却：《隆务寺志》（藏文），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8：96-97。

19 《明史》卷222《郑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5851。

20 杜常顺：《关于明代西海蒙古的哆啰土蛮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1）：105。

21 （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05《郑经洛奏疏二·敬陈备御海虏事宜以弭后患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4401。

首，即心怀赤忠，汉番皆并推誉。以□是倡导率众，并咨各部院道，筑堡曰保安，设官曰防御，又于计、吴、脱、李四寨选土兵五百名，增之以月饷；河营协防兵一百名，加之以口粮，在斯地比昔称虽更于往时有加焉。继而招中愆期，荷参台李公以廷仪抚番□□创始□□曰总理通官。又蒙协守河州副总兵周公□□□练兵□委之以该堡中军，则铃制汉番而地方颇为得人。²²

此碑原立于年都乎村（季屯）祠堂院，暗示王廷仪出自季屯并成为“汉番皆并推誉”的“屯首”，明廷又先后授其“总理通官”“保安堡中军”等职。当四屯备受骚扰“无官守防，无军所恃”之际，王廷仪响应朝廷号召并联络各屯修建城堡，得到了驻陕官员的关注。碑文落款部分上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左侍郎叶梦熊”“巡按陕西都察院兼左副都御史贾待问”，下至四屯军匠各色人等多达四十余人。新建成的保安堡“周围长六百八十四丈，东西两面各长二百二十四丈，南北两面各长一百一十八丈，高二丈五尺，根厚两丈，收顶一丈。”²³ 城堡之规模据此可见，但仍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建堡时间。非一之根据建国初保安城墙的砖刻：“重建保安”并记万历二年吉月，认为保安堡建于万历二年²⁴，此说影响甚广。宋挺生考证碑文所记叶梦熊、贾待问等人事迹，推测保安堡建于万历二十二秋冬至二十三年春夏之交²⁵。按碑文“筑堡曰保安，设官曰防御”，保安堡的修建应与其设官有关，保安设官的直接起因便是万历十八年的“洮河之变”。万历十八年（1590年），真相、火落赤诸酋进犯洮、河一带，副总兵李奎、李联芳等人相继战死，震惊朝野。万历皇帝特命郑洛经略陕甘军务，郑氏在咨諏輿情、审察方輿后认为“河洮之患，在于虏牧两川”，莽刺、捏工两川遥居河州关外且惟有归德一堡，力量薄弱。万历十九年（1591年），郑洛提议在归德、保安“添守备防御二员，庶缓急有资，唇齿自固。”²⁶ 据此，保安守备应设于万历十九年，城堡顺延几年完成，亦在情理之中。

其二，兵力构成。保安防御守备官两名，其士兵从吴、计（季）、脱、李四寨选任

22 该碑立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现藏于同仁县年都乎寺，笔者录于2019年11月5日。据赵清阳回忆此碑原立于年都乎村祠堂院，1959年村民夏吾吉为防止碑被破坏将其藏在牛圈中，改革开放后移至年都乎寺。参见赵清阳：《同仁县年都乎村“大明”石碑爰录》，黄南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南文史资料》，1996（3）：161。

23 乾隆《循化志》卷2《城池》，2008：53。

24 非一之：《同仁土族考察报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历史》，《青海民族研究》1985（2）：167-168。

25 宋挺生：《明王廷仪碑考释兼论青海同仁土族来源》，《青海民族研究》1985（2）：219-221。

26 《明神宗实录》卷241，万历十九年十月己未，1962：4501。

士兵五百名，另加河营协防兵一百名，分给以月饷与口粮。新设保安堡直接参与处置当地番族纠纷事务，如河州境外属番挫哈、郎家二族仇杀，保安堡防御守备夏光裕调王廷仪前去处置²⁷。保安堡与归德堡、起台堡互为犄角，相互应援，构成明王朝应对蒙古部落越河“抢番”的重要防线。

其三，保安堡的族属问题。按保安堡初乃脱屯之堡，明初设官置兵，脱屯之人始散处城外²⁸，碑文所载保安守备之一便是河州卫指挥僉事脱九，而脱九很可能是河州卫世袭指挥僉事“脱宠”之裔，或同出一系。有学者曾在保安堡发现《古兰经》²⁹，表明脱屯军户很可能是元明鼎革之际留居河州、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或色目人，脱氏首领带领族人归附明朝并受封为指挥僉事。永乐年间，部分脱氏族人与其他三屯一同作为屯田军户被安置在同仁地区。由于脱屯地处汉藏交通的枢纽，大量回商汇聚于此，渐成聚落。清中后期，当地多数民众迁往临夏大河家地区成为保安族的祖先，驻留当地的民众则皈依藏传佛教。

自永乐以后，河州卫四屯军户的迁入促使同仁地区渐呈卫所军户、藏族部落与寺院僧团并存的格局，面对明中后期蒙古部落移牧甘青地区，明廷积极设置保安堡统领四屯军民应对蒙古部落的“抢番”活动。但万历以后明廷深陷内忧外患，更无暇顾及甘青地区，四屯军户也在失去明廷庇护的背景下逐步与当地藏族部落融为一体。

二、清代隆务四番寨的形成与汉藏文化整合

明清易代，保安屯兵失去了明王朝的支持。在王朝国家力量缺席的间隙，四屯土千总逐步掌握基层控制权。面对新建立且优待番族的清朝，作为前明屯军后裔的四屯民众出于自身生存需求的考量，策略性地隐瞒、遗忘其明朝军户的身份，强化其“番民”“土人”的祖源记忆，以致出现“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之番民”³⁰的情况。

进入清代，清初在甘青民族地区基本因袭明代以来的统治秩序，“就其原有番目，给与土千百户职衔，颁发号纸，令其管束。”³¹同时，设保安堡守备统领屯丁，只是此时

27 《明神宗实录》卷416，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甲寅，1962：7832。

28 乾隆《循化志》卷2《城池》，2008：53。

29 马世仁：《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保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69-387。

30 乾隆《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2008：95。

31 乾隆《循化志》卷1《建置沿革》，2008：18。

屯丁仍维持明代以来自给自足的屯田模式，清人视之为“土兵”，史载“其兵即以屯丁充之，谓之土兵，故有土千总、把总等官。屯粮虽重，而纳粮之户即系充伍之兵，以粮抵饷，不纳不支。”³²但此举极易造成土酋就地做大，土兵“知种地而不完赋，知充武而不领粮”³³，守备官难以管制，所谓“土兵骄横，不习差操，往往胁制营员，历任守备，俱避居内地，不敢至营。”³⁴由此，清廷多委派地方土司管辖番务。康熙年间，清廷曾命河州乧藏族土司王拱斗担任保安堡守备并加“管守备事”³⁵，而具体管理四屯的便是年都乎土千总王喇夫旦。年都乎（ལྷན་ཅོག）是藏人对季屯的称呼，意为“霹雳降魔”或“险地”，说法不一。王喇夫旦即是王廷仪的后裔，身为“屯首”的王家世代承袭土千总³⁶。

雍正初年，清廷尝试授予番目、头人以乡约、里长等职，重整甘边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雍正三年（1725年），陕西总督岳钟琪提议：“原管番目委充乡约、里长，令催收赋科，久则化番为汉，悉作边地良民。”³⁷随后清廷命西宁都统达鼐负责循化厅各族寨工屯的编户起科事务³⁸，其中便涉及对保安四屯土兵的田赋征收，此举影响了土千总王喇夫旦对四屯的统治。雍正七年（1729年），拥兵自重的王喇夫旦与清军爆发冲突。关于事件的起因，民间传说王喇夫旦用官银修年都乎城，因南面临崖，便只修东、北、西三墙并以余款修寺院，而受到官府的惩戒³⁹。官方则一再重申王喇夫旦操纵自恃、渐肆狂逞，陕西总督岳钟琪称：

查（保）安设官兵，原力弹压番族，自应招募兵民，方於营伍有益。乃从前奉行未善，即以番族部落充募。以至土千总王喇夫旦得挟所恃，将关支兵饷，一切差操，皆操纵自恃，不由守备经理。而所募番兵，亦复效尤，尾大不

32 乾隆《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2008：95。

33 《兰州巡抚许容奏请谕令临洮府保安堡番粮亦照新附番民之例征收折》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书才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491。

34 乾隆《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2008：95。

35 参见《清康熙十四年十一月诰封乧藏土司王拱斗夫妇敕书》，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档案局藏。

36 非一之：《同仁土族考察报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历史》，《青海民族研究》1985（2）：170。

37 乾隆《循化志》卷1《建置沿革》，2008：17。

38 此处的“工”为循化厅所属撒拉回民的基层组织单位。据《循化志》记：“雍正八年征棹子山，调兵三千协剿，始分十二工名目。其取名不知何义，岂立功之义，而后仍讹为工耶？”参见乾隆《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2008：91-92。

39 非一之：《同仁土族考察报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历史》，《青海民族研究》1985（2）：171；另见扎西：《同仁县年都乎土把总家世要略》，《黄南报》2001.4.30。

掉。因而王喇夫旦骄贪日恣，渐肆狂逞。⁴⁰

清初以降，保安四屯军户已全然不见踪迹，取而代之以“土兵”“番兵”。鉴于王喇夫旦不服管制，岳钟琪奏请派兵将其擒获并革除番兵，改从内地招募民兵，期间又有诸多汉回族众迁居此处。这些番兵在解除武装后转变为种地纳粮的编户齐民，其中吴屯二百四十八户，种地四百九十八段，纳粮二十四石八斗；季屯二百五十二户，种地五百六十段，纳粮二十五石二斗；李屯二百四十六户，种地五百四十段，纳粮二十四石六斗；脱屯二百四十四户，种地四百八十五段，纳粮二十四石四斗⁴¹。四屯各设头目处理日常事务，税粮由循化厅委托年都乎土把总征收，而四屯田赋仍维持“按亩起科”的传统，不过在清朝官员看来，保安屯丁早已化作番民，所纳之粮即为番粮，仍按亩起科似有不妥，甘肃巡抚许容便奏请将保安堡番粮照新附番民之例征收⁴²，雍正皇帝亲谕保安税粮事宜：

保安一堡与新附上下隆布、阿步喇等番族界址相接，新附番族俱按户科粮，每户止纳青稞一斗，而保安则按亩起科，以不及千户之番民岁征粮八百余石，未完免多寡悬殊，非朕一视同仁之意，著将保安番粮亦照新附番民之例每户纳粮一斗，征收在仓，留为积贮，其现募之兵丁二百名，所需粮料据照例给与折色，以示朕加恩番民之意。⁴³

尽管保安屯民为明朝军户之后裔，延续着以往“按亩起科”的定制，但清朝官方已将保安屯民视若“番民”，雍正帝亦对四屯民众加以抚恤，特以番民之例“按户科粮”，在官方税粮征收层面，四屯民众被划归“番民”之列，所纳番粮充作保安驻兵之口粮。雍正七年（1729年）前后，清军对王喇夫旦的军事行动严重削弱四屯土酋的势力，失去武装的四屯民众也加速融入当地社会，而隆务寺在重新整合地方社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明末清初，隆务寺便与蒙古火落赤家族深相结纳并借助其政治影响逐渐与卫藏的格鲁派僧团取得联系，建立夏日仓活佛转世系统。至康熙年间，六世达赖喇嘛仓

40 乾隆《循化志》卷1《建置沿革》，2008：18。

41 乾隆《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2008：96。

42 《兰州巡抚许容奏请谕令临洮府保安堡番粮亦照新附番民之例征收折》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书才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491。

43 《谕著将保安堡番粮照新附番民之例每户纳税一斗征收等情》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张书才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2册，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30-231。

央嘉措授予二世夏日仓·阿旺赤列嘉措为“噶丹阿齐图额尔德尼诺门汗”⁴⁴，此称号由历代夏日仓活佛承袭，隆务寺的政教影响亦更趋扩大。就在清廷平定王喇嘛旦后不久，阿旺赤列嘉措参照宗喀巴大师的祈愿法会创办了隆务寺大法会。雍正十年（1732年），阿旺赤列嘉措和隆务昂锁阿旺洛桑商议之后，集中了该地区静修处及隆务下属所有支寺的僧人，举办了隆务寺第一届祈愿大法会。自此，隆务昂锁成为隆务寺固定的最大施主。为供应每年正月定期举行的祈愿大法会的费用，把隆务地区的藏、土、汉等民族划分为十二部分，称为“隆务十二部”，轮流承担每年祈愿大法会的费用⁴⁵。

“祈愿大法会”亦称“毛兰姆”（མོན་ལམ་）法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每年定期举行的传统法会。此次法会确立了隆务寺政教集团在同仁地区的主导地位，更将当地四屯民众纳入以隆务寺为核心的附属系统暨“隆务十二部落”（རེབ་གོང་ཤོག་ཁ་བརྒྱེས་）。隆务寺的夏日仓活佛与隆务昂锁（རོང་བོ་ནང་སོ་）⁴⁶分掌宗教与世俗事务，合称为隆务的“上师和官人”系统⁴⁷。其中隆务昂锁“有六家人轮流充当，世代接替，外人不得与也。”⁴⁸其直接统辖的“隆务德登”，包括隆务庄、四合吉庄、维哇、措玉、苏乎日、加毛、铁吾等七个部落，构成隆务寺的中坚力量。而四屯也成为隆务十二部之一并作为施主轮流承担大法会的献供布施活动。《安多政教史》记，隆务寺的“谿卡”（གཞིས་ཁ）⁴⁹包括“隆务昂锁、年都乎百户、坚木百户、赛百户、曲玛喇嘛兼官人、贺尔昂百户、浪加百户、加吾百户、贺尔官人、多哇官人等所辖的隆务七村、麻巴七村、四寨子、浪加、吉卡三部、加吾朗仓、赛三沟、曲库四部、贺尔六大部、隆务夏吾乃尔、赛川地浅山脑山三地、贺尔年桑上下等十二部落。”⁵⁰其中“四寨子”即季屯、吴屯、脱屯、上下李屯，藏语依次称为年都乎、桑根雄、脱加、郭麻日、尕沙日，合称“加册子玉”（རྒྱུ་ཁྲིའི་ཙོ་བཞི་），意为“汉四寨子”。总之，由隆务十二部轮流供养的“祈愿大法会”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方式，四屯通

44 参见智观巴·贡却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1989：297；《噶丹嘉措本生传》，青海化隆土哇寺木刻印本。

45 参见秦士金：《青海隆务寺早期历史初探》，藏学研究论丛编委会：《藏学研究论丛》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166。

46 “昂锁”亦称“昂索”“囊索”（ནང་སོ），基本含义为藏族传统社会一种官职，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功能和身份有所不同。参见仁青卓玛：《探析藏族传统官职囊索的历史演变》，《中国藏学》2016（1）：125。有学者指出“隆务昂索”是元朝帝师八思巴委派到同仁地区掌管地方政教事务的官员。参见当增吉：《隆务昂索考述》，《青海民族研究》2005（4）：151。

47 参见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1989：332。

48 《循化厅为隆务寺准备攻打河南蒙古上的稟》，青海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7-永久-2727。

49 “谿卡”（ཁེམ་ཀར་）藏文意为“庄园”，是领主经营领地的组织形式，后逐渐演变为藏族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参见多杰才旦：《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200。

50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1989:332。

过供养大法会进入以隆务寺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秩序。这既体现出四屯民众对藏传佛教的认同并得到了番族部落的认可，也加强了屯民与番民间的日常交流与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四屯村寨也纷纷建立藏传佛教寺院并由隆务寺制定了统一的宗教仪轨。特别是三世夏日仓·根敦赤列拉杰（དགེ་འདུན་འཕྱིན་ལས་རབ་རྒྱལ）直接推动在四屯中最为重要的季屯（年都乎）修建寺院。据民间传说：“隆务寺势力强大后，夏日仓三世派卡索桑到年都乎强迫他们建寺，信奉喇嘛教，他们顶不住，即服从了，在各寨子城门上放置玛尼经轮，意味着皈依隆务寺了。”⁵¹《安多政教史》在论及年都乎寺时也提到了三世夏日仓活佛，“年都乎寺扎西达吉林丹大成就者修建，由夏日诺们汗根登程勒拉杰一生护持并参加本寺的祈愿法会和其他法会等。此后，应僧俗大众的要求，由堪钦·根登嘉措任本寺喇嘛。从此以后，历任堪钦仓主持本寺寺务。”⁵²两段材料关于建立寺院并皈依藏传佛教的表述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倾向，前者可看做民间社会对隆务寺的反应，后者则出于弘法传教的立场。总之，以年都乎寺的建立并归属隆务寺为标志，作为“总头人”的隆务昂锁⁵³，以年都乎土把总为首全面统合四屯。各屯民众相继修建寺院，如吾屯上下庄寺、郭麻日寺、卧科寺，逐步形成所谓“隆务四寨子寺”。如果说“祈愿大法会”的创立标志着四屯整体上纳入隆务十二部，那么四屯寺院的建立则意味着藏传佛教逐渐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

根据清代循化厅与保安四屯的往来文书，四屯均由“红布”办理税粮等事务⁵⁴，所谓“红布”亦称“洪布”根据藏文 དཔོན་པོ་ 音译而来，是藏族民众对村寨首领的称呼。此外，官府令季屯土把总在四屯拣选善书“番字”且通晓汉语者轮流当差，承担官府文书的翻译工作，此“番字”即为藏文，应差者则称“番书”⁵⁵。显然藏文已成为屯民的通用文字，而诸如“红布”“番字”等职，亦显示出清后期保安四屯基层组织的变化。民国时期，马鹤天在当地考察时甚至将吾屯番民称为吾屯族，称其“信仰喇嘛教甚深，巷口有经幡，家家门上有经文纸，屋顶上有转轮，风吹转轮，亦一大奇观也”，又记“吾屯

51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青海省土族社会历史调查》（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62。

52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1989：326。

53 参见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1989：332。

54 参见《为更换循化供差番书事飭上下李屯红布等》，同治十二年七月初二日，青海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7-永久-3730；《为塑画神像事飭保安吴屯红布老人》，光绪四年五月二十六日，青海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6-永久-426等。

55 参见《为派番书办一名供差事飭保安四屯》，同治十二年四月十四日，青海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7-永久-3727；《为选派番书办事飭季屯土把总》，光绪四年五月二十六日，青海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7-永久-3734等。

族生男皆入寺为僧，生女赘汉人为婿，以故与汉人感情良好。”⁵⁶

文化整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借用与调适。四屯民众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同时，也促使汉地的二郎神信仰在同仁地区的传播。二郎神（ཀོང་མའི་ཁི་ལིང་）在当地民众的观念中为保护神，据当地人讲：“一村安宁、五谷丰登。全靠二郎神保佑，如遇到灾难，一呼叫二郎神，就会得到护佑。”⁵⁷值得注意的是，具有保护神属性的二郎神与当地的保护神“阿米瓦宗”（ཨ་མུ་འུ་ཨོང་）的意义相谐和，两者均可称为“将军爷”（ཨ་མུ་འུ་དམག་དཔོན་），当地民众亦常将二郎神称为“阿米瓦宗”⁵⁸。在年都乎、郭玛日二郎庙所供奉的二郎神头戴双翅文官帽，身着汉地长袍服，脚穿云纹长筒靴。而庙里常驻藏族僧人，祭祀仪式中也融入了藏传佛教、苯教、道教的诸多元素，如煨桑、跳神、活羊祭祀等⁵⁹。这种汉藏信仰元素杂糅、层累形成的祭祀仪式，跨越了民族界限并得到四寨子及藏族民众的认可。信仰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整合的最高形式则是信仰层面的交融与共享。二郎神法力高强，护佑百姓，与藏传佛教信仰、地方山神具有同样的神圣性，展现出汉藏多元文化并存的信仰形式。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当地还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暨“六月会”（བྱུག་པའི་ལྷ་རྩེ་ལོ་ལོ་）。在六月会上年都乎土把总发表讲话：“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东方的，是皇帝派来守卫这里的。”⁶⁰显示出四寨子民众迁徙戍边的祖源记忆，而一年一度的六月会也成为各族群众“同祀共欢”的文化盛宴，不同民族在相互接触、交往交流的过程中消弭了文化上的疏离感。藏传佛教与二郎神信仰交相辉映，成为汉藏各族民众共享的文化资源，展现了多民族文化并存、多种宗教信仰共生的社会实态。值得注意的是，闻名于世的热贡艺术便源于同仁四屯，其中尤以吴屯的唐卡、雕塑最为出名，吴屯先祖多为善于画艺、雕刻的江南人，当地房屋多为汉式四合院，房梁有雕花，房顶立“泰山石敢当”镇邪之物，与江南风俗颇为类似。明清以来的吴屯民众保持着绘画的传统，特别是在皈依藏传佛教后，当地画匠将内地的绘画技艺与藏传佛教艺术相结合共同创造出著名的热贡艺术，先后涌现出夏吾才让、尖木措、更藏等艺术大师。此外，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春节、端午等节庆活动也都不同程度杂糅着汉藏文化因素⁶¹。总之，随着明清数百年间汉藏民族的共居与交融，明初迁入当地的卫所军户已与藏族民众渐趋融合，不

56 侯鸿鉴、马鹤天：《西北漫游记·青海考察记》，陶雪玲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83、184。

57 聿一之：《同仁土族考察报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历史》，《青海民族研究》1985（2）：185。

58 任丽璋：《雉祭——青海热贡农区“六月会”的文化内涵》，《民族艺术》1993（3）：107。

59 马清虎：《安多热贡地区二郎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宗教学研究》2015（2）：195。

60 聿一之：《同仁土族考察报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历史》，《青海民族研究》1985（2）：178。

61 聿一之：《同仁土族考察报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历史》，《青海民族研究》1985（2）：185-186。

同民族在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文化习俗等方面相互吸收、融合与调适，折射出多民族求同共享、和谐共生的生活逻辑与历史原貌。

三、结语

历史时期的同仁地区既是汉藏民族相互接触、交融的中间地带，也是中央政府经略甘青藏族地区的重要区域，明清中央政府的制度设定与政策调整对同仁地区的组织结构、聚落形态、族类身份以及文化风俗的演变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当地卫所屯军因应藏边局势变化与清廷政策调整而采取的生存策略，促使当地的保安四屯实现了由卫所屯堡到隆务番寨的转变，屯田军户亦演变为番寨土人。最终在王朝国家与地域人群的共同参与下，同仁地区汉藏交融的聚落形态与文化风俗得以形成并演变至今，也展现出华夏边缘地带族群社会特殊的变迁轨迹及其内在发展机制。

自明初以降，明廷先后设置必里卫、保安四屯并扶持隆务寺僧团，促使当地形成了卫所军户、藏族部落与寺院僧团互嵌并存的社会格局。一方面来自卫藏的必里卫土官、隆务寺僧团及其附属藏族部落参与茶马交易；另一方面来自内地的河州卫百户及其附属屯军世代屯垦戍边，两者共同汇聚于同仁地区繁衍生息，并形成了农牧互补、多民族互嵌共融的社会结构。随着明后期蒙古部落移牧甘青与明清易代，同仁保安四屯在与周边藏族部落的互动过程中，一方面促使地域社会的组织结构、族群关系得以重组，另一方面也衍生出诸多汉藏交融的文化事象。特别是雍正年间，清廷在推进改土归流过程中削弱了地方土酋的基层控制，促使当地卫所屯军与番族部落互嵌并存的社会结构与文化风俗渐趋融合，这种融合并非表现为由“汉”到“藏”的“藏化”演进逻辑，而是不同民族间的双向互动与深度交融。明清数百年间这些屯军后裔在与周边藏族部落的交往交流中从各自生活实践与日常需求出发共同创造出了诸多汉藏共享的文化符号、信仰体系与生活习俗。这种基于共同生活地域而形成的互借共生、求同共享的相处之道与文化整合逻辑，既折射出多民族交往交融的生活情境与历史原貌，也为理解边疆地区“多元一体”民族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 许若冰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任副研究员

From Farming Forts to Tibetan Villages: Settlement Chang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b gong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u Ruob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olicy adjustme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ethnic composi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b gong area in Qinghai province. The local four Baoan villages (*baosan situn* 保安四屯) underwent a transition from farming forts (*weisuo* 卫所) to Rong bo Tibetan villages (*longwu fanzhai* 隆务番寨). The military households of the garrison also evolved into natives of the Tibetan villages. In the early Ming period, the Ming court set up the Biliwei garrison (*Bili wei* 必里卫) and appointed native officials to manage the Tibetan tribes, dispatched four military households of Hezhou garrison (*Hezhou wei* 河州卫) to station in Reb gong, and supported the monastic communities represented by Rong bo monastery (*Longwu si* 隆务寺), resulting in a pattern of coexistence of Tibetan tribes, garrisoned military households in farming forts, and monastic communities in this region. In the face of the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se four military households who had lost the protection of the Ming court, strategically transformed themselves into "natives"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twelve parts of Rong bo, serving as both subjects of Rong bo monastery and resident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nwards, the descendants of these garrison households developed a cultural synthesis in their daily interactions with Tibetan residents, characterized by the sharing of cultural symbols, beliefs and social customs, exemplifie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he Han and Tibetan ethnic groups. It also demonstrated the dynamic nature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a "multiethnic unity" society in Reb gong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 Investigation of Situ Pañchen's Visit to the Kathmandu Valle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Yao Jingyuan

(School of Philosophy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itu Pañchen Chos kyi 'byung gnas (1699/1700-1774) traveled to the Kathmandu valley from 1723 to 1724, with the Twelfth Karma pa Byang chub rdo rje (1703-1732), the Eighth Zhwa dmar pa Dpal chen chos kyi don grub (1695-1732), and the Seventh Rgyal tshab Dkon mchog 'od zer (1699-1765), and then made a second visit in 1748, with the Tenth Zhwa dmar pa Chos grub rgya mtsho (1741-